

金瓶梅 文化新解

杨子华著

善恶美丑之间 尽显众生百态

道不尽一部《金瓶梅》

破解经典奥秘 感受别样文化

一部备受争议的经典名著

一种充斥人性与伦理矛盾的文化碰撞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金瓶梅

文旭祥

杨子华著

李永祜题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文化新解/杨子华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51-319-8

I. ①金… II. ①杨… III. ①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9160 号

金瓶梅文化新解

作 者 杨子华
责任编辑 朱策英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319-8
定 价 4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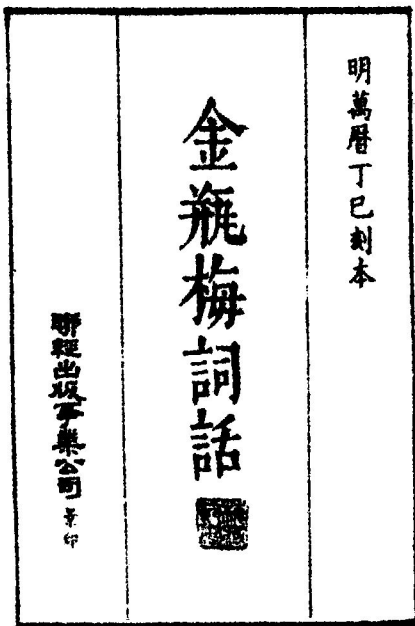
序 1

黄 霖

刚捧读杨子华先生的《水浒文化新解》不久,就收到了杨先生寄来的《金瓶梅文化新解》书稿,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已逾古稀之年的他,学术上的追求竟还如此执著,还在不断地追求着“新解”!

先生将两部大作都取名为“新解”,真可谓名副其实。古今研究《水浒传》、《金瓶梅》的论著不可谓不多,但恕我孤陋寡闻,的确还未见过一部专著立足在杭州地域文化的基点上去解读这两部名著的。当然,这不是说过去完全没有人注意过这类问题。实际上,就在我的同事中,也有人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且已出了一些成绩,但还没有将其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公之于世。

就说我自己,在 1999 年日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也曾经讲过《〈金瓶梅词话〉与杭州》这个题目。当时我说,一般读《金瓶梅词话》的人都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馆本《词话》扉页



认为小说写的是山东故事。这是因为小说一再强调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主要活动的环境是在“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第三十九回)、“山东东平府清河县”(第六十六回)。但实际上,这个清河县完全是虚构的。现实中的清河,在北宋时属河北东路,明属北直隶广平府,今属河北省,根本不在山东境内。它与山东东平府的阳谷县相去也较远,并非是小说所写的那样两县相邻。而且,小说中清河县的气派与实际上的清河县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由此得出,作者在创造这个清河县时,显然根据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以某城为主,再熔铸了其他各地的印象。那么,以什么地方为主呢?台湾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探源》的《补述》中曾说:“我曾认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实际上的地理环境,可能是燕京。”后来还有人根据这一观点写了专著。也有不少朋友认为《金瓶梅》与临清的关系甚大;有人还根据临清的地理环境绘制了《金瓶梅》中西门庆等人活动的地图。这些看法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细加考察,我认为,《金瓶梅词话》主要依据的地理环境与其说是在北方,还不如说是在南方;与其说是燕京、临清,还不如说是杭州。这是因为在《金瓶梅词话》中可以找到不少当时杭州的影子(参见《〈金瓶梅词话〉与杭州》,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5号,1999年12月)。当时我这样讲,眼光是比较狭窄的,只是举了有关杭州的岳庙、永福寺、狮子街、南瓦子、新河口、牛皮巷等例子来加以说明,以后也没有进一步去深解。现在读了杨先生的书稿,真是大开眼界。他从民俗、饮食、游戏、舞蹈、说唱、戏剧、妓女、方言等几个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杭州与《金瓶梅》的关系,不能不使人相信:《金瓶梅》里确实有杭州!更令人佩服的是,杨先生在辨析《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时,有的工作是做得十分细致的。比如说《金瓶梅》中的“宣卷”问题,前人也曾谈到过,像日本有名的收藏与研究宝卷的泽田瑞穗教授就比较早的写过文章,而宣讲宝卷这类事,也不仅仅流行在杭州一带,但杨先生将杭州的说经、宣卷及刊印、销售宝卷的历史与盛况细细说来,层层推进,就使你相信在《金瓶梅》中写到的宣卷情况是有杭州的特色的。再如,《金瓶梅》中常用“儿尾”方言的问题,虽然魏子云先生早就指出了这是





“南方人听觉中的北方话，非北方人惯常口语中的北方话”，但他并未直接指向杭州话。而杨先生就在这基础上分析了杭州“儿尾”方言的渊源与特点，明确了《金瓶梅》中的“儿尾”方言即是杭州地区的半官话吴语方言的特色。这样就使《金瓶梅》与杭州真正扣紧了关系，使我们相信杨先生的“新解”确实是有道理、有特色、有深度的。

杨先生之所以能在《金瓶梅》研究上另辟新径，是与他长期在这方面的积累有关系的。先生生活在杭州这个地方，熟悉杭州，特别是对杭州的曲艺、民俗等问题素有研究，在这基础上用杭州文化的视角来“新解”《水浒传》的特色，自然就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然后再从《水浒传》研究的道路上顺流而下，解剖本“从《水浒传》演出一支”的《金瓶梅》，岂不更是驾轻就熟？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杨先生“新解”《金瓶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在欣赏杨先生的成绩之余，也自然地想到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这一研究明显地关系到《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而有关《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而又最为招人非议的，歧说最多、争论最火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很感谢他支持我的屠隆说。正像杨先生研究《水浒传》将作者指向钱塘施耐庵一样，他研究《金瓶梅》就建立在作者是屠隆的基础之上的。这同我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当初，我注意《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时，也就是这样想的。那时我曾说，当我们就《金瓶梅词话》中比较能反映其环境特点的一些寺庙街坊与杭州的实际情况略作了一些排比之后，不能不使人感到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特别是一些杭州所特有的地名寺庙在《金瓶梅词话》中得到了艺术的表现，就更能使人觉得其作者必定是相当熟悉杭州情况的。当然，杭州在历史上从来是一座名城，能将杭州作为艺术原型来加工的未必就一定是杭州人或南方人。但是，假如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山东人，他在描写发生在“山东”的故事时，不用熟悉而接近实际的诸如清河、峰县等县的地名，反而去运用杭州的地名，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我们再进一步将小说中所用的吴语方言和反映的南方习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不是可以进一

步考虑作者是一位南方人吗？在这里，生长在距杭州不远而曾为杭州永福寺题额的屠隆，不是大有可能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吗？我的这一想法，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的。但时过境迁，到现在再静言思之，觉得这一推理是不够严密的。因为这里至少关系到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金瓶梅》的“镶嵌”问题。这个问题，杨先生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杨先生在谈到《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时曾说：“《金瓶梅》既不同于《水浒传》那样完全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也不同于《红楼梦》那样完全是个人独立创作；而是承袭了《水浒传》以及宋元话本小说的人物、故事和体制、语言的传统的个人创作。”《金瓶梅》的这种创作特点，现在我们常用“镶嵌”两字来形容，即在笑笑生个人创作的蓝图上，“镶嵌”了前人的不少现成的作品片断。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作为例证的一些材料，究竟是《金瓶梅》作者个人的手笔呢，还是“镶嵌”的前人的作品？假如是后者的话，我们就很难将它们完全归于作者的名下，说成是真正的《金瓶梅》的地方色彩了。比如，最早提出《金瓶梅》作者可能是浙江人的戴不凡先生，他在《小说见闻录》中所举证的一些吴语的例子，实际上大都是《金瓶梅》抄袭《水浒传》的部分。这些例子就很难说是《金瓶梅》作者的语言，而只能说是《水浒传》作者的语言了。

第二个是小说环境的艺术创造问题。在每一部小说里，作家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的需要创造了一个艺术环境。在《金瓶梅》里，由于“镶嵌”的缘故，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环境借用”的情况，即作家创造的西门庆、陈经济等一伙主要活动的环境明标的是清河、临清等地方，却不是作家根据当时清河、临清等实际情况来加以描写的，而是借用了现成的其他小说中描写的其他城市情况，移花接木到《金瓶梅》中来。这里最典型的要数《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所写的“陈经济临清开大店”。小说明明写的是陈经济在“临清马头”开了大酒楼，韩爱姐与父母韩道国、王六儿来到这里，碰上了陈经济，于是韩爱姐与陈经济两人相爱一场。但这段故事的基本情节显然是从《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那里抄来的，乃至有的人物名





字也一样,如“八老”。不同的只是将主人公的名字与故事发生的地点换了一下:将“临安”城外的“新桥”换成了“临清马头”。因此,在《金瓶梅》中陈经济活动的艺术环境是一个作家想象中的临清,但这个“临清”是“虚”的,其“实”却是“杭州”。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作者之所以将《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杭州移花接木成临清,还是根据他的整个艺术构思来进行的。其前提是,他觉得这样的环境描写是符合他意象中的“临清马头”的,与小说其他地方提到的“临清马头”都是接轨的。因此《金瓶梅词话》中的临清是小说家经过艺术创造后的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环境,这个环境既符合小说家对临清的认识,也大致反映了(或者是在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临清。否则,作者在“镶嵌”《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故事时,完全可以将“新桥市”另换一个地名而不用“临清”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考察《金瓶梅》文化中的地域因素时,还是要区别由“镶嵌”而造成的“虚”与“实”的不同情况。我们要努力考出它的“实”,但也要对其“虚”的描写予以足够的重视。作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创造一个与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开展相匹配的艺术环境的。

第三个是小说流露的地方色彩的唯一性问题。在关于《金瓶梅》作者讨论中,不时看到一些考证某词语、某名物为某地所有的文章。这固然也有参考价值,但往往不能说服人。因为没有解决一个“唯一性”的问题。你说这词语、这名物为该地所有,但都无法证实只有该地有而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当自己说得头头是道时,另一人马上会出来说不一定,其他地方也存在。比如,就杨先生提到的晏公庙、水月寺来说吧,一些学者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些寺庙是临清的。最近我去临清,临清的先生还告诉我晏公庙在什么地方。但是,杨先生认为,这些寺庙就是杭州的。比如水月寺,杨先生还举证说:“据《武林旧事》卷五载:杭州慈云岭有‘水月寺’。杭州宋元话本《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二十卷):‘只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禅师’。故孟昭连先生在《漫话金瓶梅》中认为‘《金瓶梅》中的水月寺是移用了临安(杭州)的水月寺,而非临清的水月庵。’”这番话说得有



根有据,但毕竟不具备排他性,就不能完全说服人。实际上,像晏公庙、水月寺(庵)之类,当初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前几年,我在日本还见到过“水月庵”呢。总之,我们在研究小说文化的方地方性时,在“唯一性”上再下点工夫,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三点,是我觉得当前研究古代小说文化的方地方色彩时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我在这里提出这三个问题,不是否定一般地考索《金瓶梅》与其他小说的方地方色彩的问题。这种考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还是为进一步辨清是“镶嵌”的还是“创作”的,是“虚”的还是“实”的,是“唯一的”还是“共存的”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像杨先生这样,下了工夫,把《金瓶梅》中有关杭州的情况原原本本、阳详细地钩稽出来,就不能不让大家去认真地深思:《金瓶梅》与杭州究竟有什么关系?《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山东人还是浙江人?

笔走至此,不能不感谢杨先生对我的信任。杨先生与我虽然联系多年,但从未谋面。他嘱我作序,我就将我的想法直言书之。对先生的成绩,我由衷的佩服。我在摸索过程中的一点粗浅的想法,只是借此机会提出来与杨先生、与金学界的朋友们共勉,以求将我们的金学研究搞得更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序 2

侯 会

去年年底，刚刚拜读了杨子华先生的大作《水浒文化新解》，未及半年，又有幸捧读杨先生的新书稿《金瓶梅文化新解》。在字里行间，我感受到这位七旬老人对中华文化及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由衷的热爱，可谓老而弥坚、乐此不疲。

我与杨先生神交已久，但初次见面却是在去年秋天梁山之巅的忠义堂前。我们共同参加了山东省梁山县举办的“2007《水浒》文化研究高层论坛”。在会上会下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杨老早年就读于浙江师院，曾亲受小说研究名家胡士莹先生、徐朔方先生的指点，并很早发表了学术论文。如此算来，杨老研究小说的历史，已逾半个世纪。

杨老对小说中的文化因素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杭州的历史文化兴趣更浓。可以说，这一切在杨老心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
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
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
也如諸婦多笑而獨以潘金蓮李瓶
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樗枏之意也蓋
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序
2



中形成一种“杭州情结”，而这种情结的养成，显然与杨老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常年读书、生活的经历分不开。熟悉小说的读者自然知道，一部话本小说发展史，几乎每一页都打有“杭州”的印记。早在宋代，杭州便与开封相携成为话本小说的发祥地和本营。《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元人笔记，都翔实记录了说话艺术在号称“销金锅儿”的杭州瓦舍发展壮大的盛况。这种盛况从两宋延至元明绵绵不绝，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小说家，如施耐庵、罗贯中，便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一些以刊印小说而名扬四海的书坊，如张家书坊、清平山堂、容与堂等，也都设在杭州。此外，杭州城的城门街巷、西湖的湖山胜景，也都频繁出现在小说中，为读者所熟悉——杨先生生活在这样一座历史悠久、氤氲着浓郁古都氛围的城市中，他的学术研究始终离不开自己的母亲城，也便是容易理解的了。

在前一部大作《水浒文化新解》中，杨老的“杭州情结”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中各篇无论涉及商业文化、民俗文化，还是方言文化、地域文化，全都是围绕杭州来谈的。这从许多篇目标题也可以看出，像“流传于杭州的有关武松的民间故事”、“杭州民间传说中的梁山好汉张顺”、“鲁智深与钱江潮的情缘”、“施耐庵对西湖满怀深情”、“施耐庵笔下的杭州城门”、“施耐庵是杭州书会才人”等。

对于《水浒传》故事最早成型于杭州的说法，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曾在《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水浒传》早期传说是在江、淮一带传播，并由南宋都城杭州给予“最后的提炼和总结”。这个看法，可以说与杨先生不谋而合了。

不过说《金瓶梅》与杭州密切相关，这却是我以前没有过多考虑的。记得还是在梁山开会时，我第一次听到杨先生的这个观点。那次闲聊，我说杭州的方言与周边的吴方言似乎有所不同，即有很强的“儿化”倾向。例如到饭馆吃饭，服务员高喊：“片儿汤一碗！”对“儿”的强调比北方话还明显。杨先生接口说：《金瓶梅》的人物对话也有很强的“儿化”倾向，这是典型的





杭州方言的特点。我听了,将信将疑。实际上,杨先生并非信口而谈,他对此是做了深入考究的。这回读到《金瓶梅文化新解》书稿,其中有一节就专门讲到小说中“儿尾”方言的问题。杨先生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列举了大量“儿尾”词,来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有可能是浙江人,所用的语言即杭州方言。

我们以往读书,注意力多半放在情节和人物上,对生动的语言虽然也不免击节称赏,但涉及“儿”音这类的“小”特点,却关注不够。如今读了《新解》所举例证,感到《金瓶梅》中的儿尾词汇,确实与北方话有所不同。北方话中的“儿”作为语尾,发声时常常与前一个字融合无间,记录成文时,似无单独标出的必要。而就我在杭州饭馆里听到的“片儿汤”一词,若记录成文,则其中的“儿”字理当特地标出,方能显出其方言特色。如此看来,《金瓶梅》作者不厌其烦地标出“儿”字,这一语言现象真的不能小觑。——只是我对其他地区的方言(如山东方言)不熟悉,尤其对历史上的方言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如杨老能对历史上的各地方言作一番考察比较,证明这种十分明显的“儿尾”发音是明代杭州方言独有的特征,结论就更能令人信服。

当然,杨先生论证《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并非局限于语言一端,还涉及民俗文化、说唱文化、宗教文化、戏剧文化、茶酒文化等。例如,书稿中对《金瓶梅》中出现的几座佛道寺观作了考察,发现小说中的水月寺、报恩寺、永福寺、晏公庙等,都可以在杭州的地志图籍中找到它们的原型。这对说明《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无疑是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此外,在服饰发式方面,《金瓶梅》中出现的“杭绢”、“杭扇”、“丁香儿”(一种妇女饰物)、“杭州攒”(一种发式)等,也都是出产或流行于杭州的事物。饮食文化方面,则小说中提到的“鲃鱼”、“鳊鲚”、“泡螺儿”、“香茶”等,或为杭州特产,或为江浙风物,也都可以成为小说家具有“杭州情缘”的佐证。至于《金瓶梅》在情节、人物、韵语等方面对兴起于杭州的宋元话本的借鉴之处,书稿中也举了不少例子。读着杨先生浸润着乡土情感的文字,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会

对《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产生兴趣,并在阅读小说时有所感悟,得出自己的结论。

杨先生对历史文化内涵的钩稽与阐发,是本书的另一看点。拿茶文化一节来说,作者从“茶坊”说起,捎带说到茶坊女老板王婆及其“马泊六”的兼职,而后介绍如何“点茶”、“泡茶”,后面还谈及“吃茶”、“下茶”等婚嫁礼聘习俗。这一节中还介绍了各种茶的名目,有“胡桃松子泡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蜜饯金橙子泡茶”、“和合汤”、“梅汤”、“姜茶”、“香茶”、“芽茶”,不一而足。这些名目,我们在读小说时往往是一目十行,杨老却将其一一拈出,细加说解,且旁征博引、言必有据,讲得生动有味。读之不禁令人对古代市井中带有文化气息的物质生活悠然神往。而这些,其实正是《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独有特点,特别值得读者玩味。

此外,《金瓶梅》中的人物如何过节、如何娱乐、彼时的戏剧舞台上搬演何种剧目,那时的妓院又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佛经宣讲又是如何与百姓生活接轨……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子华先生在书中都一一作了阐发。我相信,很多读《金瓶梅》时遇到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部书中得到圆满的解答。

我非“金学”专家,三十年前初读《金瓶梅》时,甚至嫌其语言啰唆而中途释卷。不过随着年龄渐长,阅历稍增,文学鉴赏力也微有提升,这才发现《金瓶梅》的诸多优点,认识到这确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奇书。去年我曾应约写过一本小册子《食货金瓶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金瓶梅》中的衣食住行等经济因素,发表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今天读《金瓶梅文化新解》书稿,感到与杨老有很多共同见解,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杨老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邀我写一篇序言。我感谢杨老对我的厚爱与抬举,推辞不过,只好抱着学习的态度,写了以上的读后感。不当之处,还请子华先生指教。

戊子三月,于大兴容与堂



目 录

序 1 / 1

序 2 / 7

民俗文化

《金瓶梅》所描写的元宵民俗 / 3

元宵灯市中流光溢彩的烟火 / 14

《金瓶梅》所描写的婚姻民俗 / 22

晚明时期的女子缠脚之风 / 40

《金瓶梅》所描写的女子服饰文化 / 56

饮食文化

《金瓶梅》与杭州的茶文化 / 87

《金瓶梅》所描写的酒文化 / 104

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文化 / 123

游戏文化

晚明时的游戏民俗 / 145

妓院里的足球游戏 / 161

西门庆家酒宴上行的花色繁多的酒令 / 177

从“耍子(儿)”看西门庆大家庭的娱乐生活 / 191



舞蹈文化

从“货郎儿”到“鲍老儿”

——《金瓶梅》所描写的民间舞蹈 / 219

说唱文化

《金瓶梅》与宋元明的说唱艺术 / 235

《金瓶梅》与明末杭州的佛教说唱文学——宣卷 / 253

戏剧文化

从“笑乐院本”《清王勃》说起 / 273

妓女文化

晚明时的妓院文化 / 289

方言文化

“没脚蟹”、“乔家公”、“葫芦提”及其他 / 307

富有感情色彩的“儿尾”称谓方言 / 331

运用“儿尾”方言来描写人物 / 347

最具市民意识和民俗色彩的隐语 / 361

地域文化

永福寺、狮子街、晏公庙究竟在什么地方？

——《金瓶梅》与杭州的地理情缘 / 377



民俗文化

